

考古学参考资料

5

考古学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5

文物出版社

北京

考古学参考资料

5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号

一九八二年三月 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内部发行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统一书号：11068·980

定价：0.90元

目 录

- 李济著《安阳》一书评介…………… (美国) 张光直 (1)
- 三十年来日本研究甲骨学的概况…………… 郭振录 (10)
- 裘卫诸器考——关于西周土地所有制
- 形态的我见…………… (日本) 伊藤道治 (22)
- 陈梦家及其对殷周青铜器的研究…………… (日本) 松丸道雄 (45)
- 苏联库切拉著《中国考古学》评介…………… 杨宝成 (58)
- 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 (日本) 大庭脩 (67)
- 现阶段的敦煌学…………… (日本) 藤枝晃 (85)
- 农业和工艺的起源:
- 西亚还是东亚? …………… (苏联) P. M. 蒙恰耶夫等 (104)
- 关于和平文化阶段…………… (越南) 黄春征 (119)
- 书刊介绍…………… (141)

李济著《安阳》* 一书评介

张光直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

在公元前整整一个世纪前，司马迁在其著名的《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到一个事件的地点时这样说：“洹水南殷墟上”。说中国的学者向来知道河南北部安阳附近的殷墟大概是合乎情理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对商代青铜器的盗掘至少早在东汉就已经开始，宋代的《考古图》（1092年）就把安阳（或鄴郡）列为商代有铭青铜器的出土地。但是，也许因为这是整个华北已知的几十个（如果不是几百个的话）青铜器出土地之一，所以直到十九世纪末在殷墟偶然发现了甲骨文之后，考古学家们才终于来到商代的最后一个都城（公元前1350—1100年）遗址。192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并在其下建立了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年轻的新所长傅斯年最初的几个行动之一，就是在1928年年末派董作宾到安阳去调查，经过几十年的盗掘之后，安阳是否还有什么甲骨保存下来，以及这个考古遗址是否还值得发掘。董氏的报告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傅氏决定将发掘殷墟作为他的研究所第一项重要的考古工作，但是，他首先必须寻找一个受过充分训练的学者来担任该所的考古组组长并领导这项发掘工作。

李济，原籍湖北，在1928年是一个32岁的年轻考古学家，

* 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华盛顿州西雅图，322页。

可是他不仅颇具声望，而且资历不浅。他在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南开大学（天津）和清华大学（北京）任过教，是最早用新的田野考古方法来发掘一处中国史前遗址（1925—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中国学者，也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这部开创性著作（192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作者。1928年年底，李济从华盛顿归国，途中在香港停留，从那里前往广州并被引见傅斯年。傅氏当时就在那里请他主持新成立的考古组并领导安阳发掘工作，李济接受了。1928年至1937年著名的安阳发掘就这样开始了。而打这以后的一切，就成为历史了。但实际上，就见诸文字简载的意义来说，这一切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安阳的最后一季田野发掘于1937年6月19日终止了。18天后，即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漫长的中日战争从此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同它的安阳文物，不得不从南京转移到长沙、昆明，最后搬到了四川的李庄。1945年之后，该所迁回南京，但是四年之后，它又不得不随着国民党政府再次迁移，迁到台湾。尽管到处迁移，这些文物大体上完好无损，但是考古人员却沿途减少和分散了。结果，原计划中的1928—37年发掘的正式报告未能编成出版。

《安阳》既不是仅有的也不是头一部介绍1928—37年发掘概况的书。但这是安阳发掘的领导者本人所作的叙述，作者常被人们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创始者，或中国考古学的元老。仅据这些理由，就应该说《安阳》是一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书。

本书的十五章可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8章）是对导致中央研究院于1928—37年进行发掘的情况所作的历史回顾和发掘工作的概述。李济以一些主要人物为中心展开他的叙述。他从王懿荣和刘铁云开始，这两位晚清学者在一剂中药中

发现的甲骨文引出了这一连串事件。在这个最初发现之后，刻辞甲骨在古董收藏家中就尽人皆知了。接着，作者谈到罗振玉、黄濬、徐坊、方法敏（Frank H. Chalfant）、库寿龄（Samuel Couling）、金璋（L. C. Hopkins）、林泰辅（Haya-shi Taisuke）、明义士（James M. Menzies）以及其他主要收藏家。小屯这个所有甲骨文的来源地，当时成了私人发掘的一个猎场。虽然这些蒐集活动有很大一部分造成了应该受到谴责的破坏，但是很多甲骨却终于幸运地被收入到学术性的著录里，并在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等知名的古典学者手里成为研究金石学和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李济来说，孙、罗、王的甲骨文研究所代表的传统学术成了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根基。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诸如考古学、地质学以及古生物学等与田野考察技术有关的欧洲科学。李济接着求助于葛利普（W. W. Grabau）、安特生（J. G. Andersson）、步达生（Davidson Black）、魏敦瑞（J. F. Weidenreich）和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们是把西方技术、方法，以及现有最高标准的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来的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李济也都认识他们本人，他的叙述就包括特别有价值的个人回忆和印象。

李济所叙述的安阳发掘，是汇集东、西方两组研究活动的结果。李济在第4——8章里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发掘工作（从1928年董作宾的初次调查开始），他自己接受委派领导这项工作的情况、两处主要的田野发掘（小屯的宫殿、宗庙遗址及文字和西北岗的王室墓地）、战争年代（1937—45年）为了继续进行安阳研究工作所作的努力，最后，还谈到本世纪最近二十五年中（1949年到七十年代中期）日益减少的工作人员在台湾

为研究和出版大部分安阳文物而作的斗争。

在我看来，李济对过去五十年来该研究所的安阳研究工作所作的第一人称叙述，是他的书中最有资料价值和最感人的部分。最初，中国的考古研究只不过是少数几个学者酝酿并付诸实践的想法。这少数学者是：古典学者中的王懿荣、刘铁云、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现代学者中的丁文江、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和吴定良。这后一部分学者终于主持了安阳的发掘工作，从而在中国建立了现代考古学。这一成就主要是由于他们在1928年以后能够接近国民党统治机构中的上层人士，以及他们享有接触西方科学家介绍到中国的考古学知识的特殊条件。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在中国进行研究工作，却用欧洲文字发表研究成果。正如李济所指出的：“对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士来讲，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能够得益。”（第36页）德日进“在中国推广科学的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但是“只有少数人有幸认识他”（第48页），正是这些极少数受过专门训练和享有特权的人促进了并且总的来说控制了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安阳的工作。小屯的普通村民同埋在他们脚下的精美的安阳文物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或未被授权而私自挖掘，或充当雇工。这一点同当代强调考古学为“工农兵”服务和强调让他们作为考古训练班学员之类的有关人员直接参加发掘工作真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我们杰出的学者们，以他们的知识、献身精神和才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总结在《安阳》这本书里）。这个遗产属于考古学史，并将裨益于所有利用它的人。

李济的叙述还包括另外一些逸闻，这是关于考古学与外界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的其他方面的事。安阳发掘工作在很

大程度上依靠美国的财政支持，但是安阳也从根本上触动了中国人的民族历史感，由此而产生的紧张状况，可用李济自己与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的交往经过来说明（第56、68页）。这些发掘也同1930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令有直接联系（第63页），但是直到1949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之后这个法令的精神和条文才得以彻底贯彻执行。然而，尽管有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与热情，但战争却终止了安阳的发掘工作，并且大大地影响了安阳的研究工作和出版计划。

“1937年11月的某日，当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几乎全体成员聚集在长沙一个路边小旅店时，每个成员都郑重地说出他在战争中希望做的事。”（第122页）

结果是相当多的考古学家改行干别的事去了，于是安阳考古学家原有的队伍就逐渐减员，直至今日，长沙聚会之后四十年，该研究所在台湾只剩下了李济、石璋如、高去寻和李光宇几个人在整理保存下来的笔记、记录及照片，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同行以及中国人民出版叙述这个初期工作的报告。因此，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发掘领导人自己所作的果敢努力，以向世人报告恰好五十年前由傅斯年在广州交给他的工作的完成情况。尽管由于“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第156页）这一事实，李济表达了他的伤感，但是李济和他的同事们提出这个报告已经赢得我们对他们的毅力的加倍赞扬。

该书的第二部分（第九章至第十五章）“对迄今为止安阳发现的各种研究作了一个简短的综述”（第158页）。每章的题目相当清楚地点出了所涉及的问题：古代中国的史前遗存和传统记载，建筑、经济，装饰艺术，世系，贞人和亲族关系的一

些问题，对祖先和其他神灵的崇拜，关于殷商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这些篇章对一些已经发表过的资料作了很有用的和有时是很透彻的概括，偶而还包括了至今未曾发表过的资料（主要是照片）或者新的解释（例如小屯的地层，第104页、179页）。但是，作者在他的概述里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就只收录了曾经或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学者们所从事和撰写的安阳研究的成果。对于所外学者所撰写的关于安阳、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作者所遗漏的就多得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了。因此，这本书对安阳的各种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既不完整又带偏见的概述。

本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遗漏是没有指出战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在安阳继续进行这个事实。李济在书中有些地方逗弄地暗示他知道一些“最新的发现”（第113页），但是显然他在计划写此书时就决定在他对安阳的叙述中不收录1949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获得的工作成果。尽管人们可以理解和领会这一决定的理由，但事实依然是关于安阳的这本书并没有多少实际上可以得到的有关遗址的重要资料，一个毫不关心时事而只想了解这个遗址的读者不得不认为这本书对他的需要来讲，是不完全的和令人失望的。我在下面为这样一类读者提供一个在刊物上登载过的新的田野考察年表，并附参考文献的出处：

1950年 西北岗东区的王墓和四盘磨、花园庄附近的平民居住遗址（《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第1—61页，）

1953—54年 大司空村（《考古学报》1955年第九册，第25—90页，

1955年 小屯南地（《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

- 63—72页，
- 1957年 薛家庄（《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第31页，《考古》；1963年第4期，第213—216页，《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第22—26页，
- 1958年 大司空村（《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第51—62页，
- 1958—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这一年开始对安阳的考古遗址进行广泛的和连续不断的调查。在小屯、苗圃北地、张家坟、白家坟、梅园庄、孝民屯、北辛庄、范家庄、后岗、大司空村、武官村（西北岗）等地获得重要发现。（《考古》，1961年第2期，第63—76页，《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第35—36页，《考古学报》，1961年第1期，第1—5页，
- 1959年 〔在安阳殷墟〕修建了作为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部的博物馆
- 1962年 大司空村（《考古》，1964年第8期，第380—384页，
- 1969年 西北岗东区（《考古》，1977年第1期，第20—36页，
- 1971年 小屯（《考古》，1972年第2期，第2—7页，《考古》，1975年第1期，第27—46页，和后岗（《考古》1972年第3期，第14—25页，
- 1972年 后岗（《考古》，1972年第5期，第8—19

- 页，和孝民屯（《考古》，1972年第4期，第24—28页，
- 1973年 小屯（《考古》，1975年第1期，第27—46页，
- 1975年 小屯（《考古》，1976年第4期，第264—272页，
- 1976年 西北岗（《考古》，1977年第1期第13—19页，同期第20—36页，《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3期，第210—214页，和小屯（《考古》，1977年第3期，第151—153页，《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57—98页，

1976年小屯的发掘（对李济来说，即使他想把新的发掘成果收入他的书里，这个发掘工作也是新近得无法收入的）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是唯一的一座完全没有被盗过的安阳“王室”规模的墓葬。从这一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两百多件）就超过1928—37年发掘的所有墓葬里出土的青铜〔礼〕器的总数（共176件）！这就使得事情变得十分明显，安阳商代文明的一个完整的综述必须考虑到李济及其同事的接班人所得的新发现。

本书在技术和编辑方面，缺点不少。但是，如果考虑到作者和他的出版者之间相距之远，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作者不能对下列主要缺点负多少责任：

（1）彩版的质量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2）很多插图的说明文字（如插图9）没有根据大为缩小了的尺寸而采用适当比例的字号。

(3) 很多人名和地名采用了很古怪的罗马拼音，有些人名、地名则译得不正确。很多-n和-ng字尾互换了位置：成(城)被拼成Chen，金被拼成Ching，伏生(汉代学者)被拼为伏申(Fushen)，李景聃(考古学家)被拼为李锦聃 Li Chin-tan)等等。本书应该让懂得使用罗马拼音的讲汉语普通话的人过目一下，以便统一拼音。

另外还有些小错：“安阳的科学发掘”始于1928年，而不是1927年(第3页)。苏萨(Susa)在伊朗，不在美索不达米亚(第41页)。1926年德日进对北京人的最初怀疑不可能是由于他在伪造的皮尔当头骨方面的经验(第46页)，因为这个伪造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才被揭穿。作者在第245页说：“〔王亥〕取地支的最后一个亥字为他的名字这一事实似乎从未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任何好奇”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个事实早就被王国维注意到了，并且成为胡厚宣等人的一个讨论题目。

(原载《哈佛亚洲研究双季刊》1978年,第38卷第2期。陈思民译,
王俊铭校)

三十年来日本研究甲骨学的概况

郭振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日本，对甲骨文字的搜集、研究始于林泰辅，他1909年开始介绍殷虚出土的甲骨文，于1921年编著出版《龟甲兽骨文字》一书。与林氏同时收集研究甲骨文字的有：富冈谦藏、后藤朝太郎、内藤虎次郎、松崎鹤雄、饭岛忠夫、驹井和爱、八幡关太郎及梅原未治、松田寿男等人（详见董作宾的《甲骨学六十年》）。但是，将甲骨文字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还是1949年以后。一方面，解放后我国十分关心文物考古工作，甲骨学的研究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不论是零星的还是成批的甲骨文的出土都是科学发掘；出土地亦扩大了范围，郑州等地相继发现殷代的甲骨卜辞，尤其是在北京昌平、陕西周原等地先后发现西周的甲骨文字；在研究上改变了昔日偏重字词的考证，而是将甲骨文同文献记载、田野考古、民族学等相结合，通过互相印证，探讨殷代的社会历史。这些情况，对于日本甲骨学界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继承了前辈的研究成果，经过辛勤的劳动，将甲骨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论是资料的蒐集整理，还是研究，都取得了可喜成果。现试从下面几个侧面，将三十年来日本学者研究甲骨学的概况，作一扼要介绍。

一、甲骨资料的搜集整理及著录

(一) 甲骨资料的收集整理: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流散在日本各地的甲骨数量较多,除已著录的《龟甲兽骨文字》等书外,三十年来,有不少人精心地收集散佚于各地的甲骨,包括官方及私人收藏品,并及时编纂出版,使这些珍贵的资料得以及早供世人研究。其中有:

贝塚茂树主编、伊藤道治协助编纂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部分)^①,精装全二册,收录的是黑川幸七、上野精一及贝塚氏三家收藏的3599片甲骨文字(除伪刻231片及其他330片没收录外,实收3246片),全部为拓本。本书在编辑时,除对原骨作了缀合外,还将甲与骨分别编号。既按卜辞的时代先后进行分期处理,又将每一期卜辞按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在《释文篇》^②中,序论除介绍收录的甲骨收藏、整理情况外,还着重叙述了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见解。对每片甲骨,都详细注明其质料、所属期别和内容分类等。对不清晰的拓本,另作摹本,不过由于缩小而有所失真。该书的《索引》^③部分,按《说文解字》的顺序编排。

青木木菟哉编辑的《书道博物馆藏甲骨文字》^④,共收录350片甲骨,全为摹本。

松丸道雄编纂的《散见于日本各地的甲骨文字》^⑤,共收录38家的甲骨560片,全部为摹本。蒐集的目的将日本公私零星收藏的甲骨汇集起来,包括一部分已有著录的甲骨。著者对各家甲骨的收藏来源、著录及现状诸况皆一一予以介绍。通过这次收录,零星散佚日本各地的甲骨想必皆已包括进来。

东洋文库古代史研究委员会编辑的《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

字》^⑥，收录614片甲骨(除伪刻的23片外，实收录591片)，全部是林泰辅归藏，皆为拓本。该批甲骨先收入《龟甲兽骨文字》，其后《殷契遗珠》、《龟卜》及《卜辞通纂》等书也作过部分著录。本书的选片、断代、释文、手拓、分类及索引等，由松丸道雄等人承担。按甲、骨分录，时代按五期划分，内容包括祭祀等十二项。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拓本是照原骨拓印，弥补了《龟甲兽骨文字》仅录原骨的某一部分，而将其他部分剪掉的缺陷，从而恢复了甲骨的原貌。

从事收集整理散佚的甲骨文工作的还有伊藤道治。他先后著录有：《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大原美术馆藏甲骨文字》、《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及《桧垣元含氏藏甲骨文字》等。随后他将以上诸处的藏骨加上《关西大学考古资料室藏甲骨文字》汇编为《日本所见甲骨录》^⑦一书，共收录97片甲骨，全部为拓本。著者对各家的藏骨情况都予以介绍。甲骨按期别、事类编排。在释文中每片甲骨都附有摹本。尤其是著者将《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逐片同《佚存》、《遗珠》及《前编》等书对照，并注出重见之号，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二) 甲骨学论著出版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甲骨学方面的专著，分别由《京都朋友书店》、《东京弘文堂》、《中央公论社》、《东京二玄社》、《五典书院》、《东京平凡社》、《东京大安》、《东京角川书店》等十几个单位承印，出版有数十部专著。登载研究甲骨文论文的杂志，除专门刊物《甲骨学》^⑧外，还有《东方学》、《东方学报(京都)》、《史学研究》、《宗教研究》、《史

学杂志》及一些大学学报等70余种，共刊登甲骨学方面的文章200余篇。以甲骨文字为研究对象写论著的达六、七十人之多。

运用甲骨卜辞并结合文献记载，探讨殷代历史、祭祀礼制、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著有：贝塚茂树的《中国的古代国家》（东京弘文堂，1952年版）、《古代殷帝国》（《京都みずず书房》，1957年初版，1967年重印）及十卷本《贝塚茂树著作集》的第三、四两卷，即《殷周古代史之再构成》、《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白川静的《殷·甲骨文集》（东京二玄社，1963年）、《说文新义》（五典书院，1969年）、《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之构造》（东京平凡社，1972年）、《甲骨金文学论丛》（1955年油印，京都朋友书店1973年铅印）。岛邦男的《殷虚卜辞研究》（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初版；东京汲古书院，1975年重印）、《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67年初版；1971年增订版）。戴内清的《中国天文学》（恒星社厚生阁，1950年）、《中国的天文历法》（东京平凡社，1969年）。伊藤道治的《古代殷王朝之谜》（东京角川书店，1967年）。松丸道雄的《甲骨文字》（东京奎星会出版部，1967年）、《关于殷虚卜辞的田猎地——殷代国家的构造的研究》（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1册抽印本，1963年）。池田末利的《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广岛创元社，1964年；另曾连载于《甲骨学》4——10号上）等等。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甲骨学研究造诣较深的岛邦男编著的《殷墟卜辞综类》一书。该书花费近十年功夫，三易其稿，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甲骨的所有文字。正如著者所说：“除了一字一字地编辑全部资料外，其他的办法是没